

1993年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振 歌

第二届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10月25~28日在风景如画的武汉珞珈山举行。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教授、湖北省文联副主席陈东成、省作家协会主席鄢国培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毕矣午、牛汉等老一辈作家、诗人与日本、韩国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陆耀东先生主持。50余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共话曹禺研究。

会议认真总结了以往对曹禺研究取得的成就,并就所运用的理论方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代表们普遍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研究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其研究的规模和深度基本上与曹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已有大量的论文和论著,其中仅《雷雨》的研究文章就有300多篇。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教材都把他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介绍评说。一些同志指出,如果从研究方法来看,曹禺研究以80年代中期为界,划分为两个大阶段。前期的研究偏重于政治、社会、历史批评,80年代中期以来,新观念、新方法开始走进曹禺研究,视野相应开阔,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昌切把前期研究概括为现实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强调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了曹禺作品中某些本质性的内涵。但往往让作品验证理论,导致曲解和放纵倾向性而悖逆真实性,社会学尺度取代艺术尺度。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沿袭这一研究模式并试图超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成说,但在理论规范、思维方法上仍无明显创意。有的代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曹禺研究并非清一色地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用阶级分析代替艺术分析,传统的美学批评仍占有相当的地位。尤其在新时期开始后,历史——美学的批评为许多学者所运用,为曹禺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对80年代以后的研究所取得的可喜进展,代表们普遍持赞赏态度,认为是在理解曹禺、认识曹禺、把握曹禺中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比较研究成为曹禺研究中的热门,在各种各样的新的批评方法尝试中显得十分醒目,成果也相当显著,曹禺与西方戏剧的关系在比较研究中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莎士比亚对曹禺创作的影响倍受关注,探讨也相当深入。其它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有所展开。但总的说来,还不构成一种恢宏的气象,尚未形成一个全新的研究格局。

结合以往的研究,代表们就今后曹禺研究的方向、格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曹禺之于中国现代话剧,如鲁迅之于中国现代小说,郭沫若、艾青之于现代新诗,其重要贡献、影响、地位人所共识。他的作品在发表、上演之初就引起轰动效应,几十年来不断上演,经久不衰,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他的作品也走上了西方的舞台,这在中国剧作家中是为数极少的。曹禺的剧作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他称得上是世界性戏剧大师,他的目光面向人类,以巨大的同情关注着人类。因此,他的作品所包蕴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时代和民族,而具有世界性和超越性的内涵,具有极其丰富的可阐释性,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研究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发掘和汲取,使这一人类精神财富充分展现出它的内在魅力,真正介入人类的现实生存。学者们指出,曹禺研究的发展,有两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要把艺术作品无限多样的可阐释性与艺术研究理论层次的丰富多样结合起来,这样,作品与研究之间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长久的对话。二是要把作家作品研究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求新求异本身不是研究的目的。田本相先生在他的书面发言中检视了研究方法单一带来的局限,指出曹禺研究获得突破,必须依托于方法的更新和理论建设。他希望中青年学者要有宏大的理论抱负、理论勇气,摒弃

小家子气,通过具体作家的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品格和理论方法,敢于超越前人也敢于超越自己。他还强调用宽容的精神来对待学术研究,信守学术的尊严和自由。陆耀东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把曹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必须拓宽研究思路。如拉普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给文学创作和理论带来影响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这对曹禺有没有影响?将曹禺与左翼剧作家比较,有哪些区别?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代表中国现代话剧创作前所未有的高峰为什么不是左翼剧作家而是曹禺?对一些问题作综合性的宏观思考和研究,有助于说明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多作研究,不匆忙下结论,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他主张在研究方法上各展其能,不能说哪一种方法最好,要让研究本身来说明。北京大学的孙庆升先生认为,拓展研究领域,把曹禺研究引向更广大的空间,从大文化角度,对曹禺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十分必要。有的同志提出用超历史的批评方法来研究曹禺,并把它表述为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不仅把曹禺及其创作看作一种文学现象而更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代表们认为,学术自由即是在坚持科学、客观原则前提下的思考的自由、方法上的自由。研究方法不应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各种方法在科学性原则下都可以进行尝试。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接受批评、文本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等等,符合作家、作品实际,都应允许存在,和而不同。华中师大黄曼君教授指出,各种方法齐头并进,在理性思辩上下真功夫,走出实验阶段,形成曹禺研究的不同学派、类型,这将推进深化曹禺研究、形成体系化研究格局的进程。

与会学者还从文化学角度对曹禺创作中的文化意识、文化品味、文化倾向以及与多重文化融合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文化问题在近几年曹禺研究中已引起重视,曹剧中的宗教意识、宿命观念、乱伦、复仇、人道主义、原始主义、神秘主义等等都广为研究者所涉及,在某些方面也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代表们认为,对这一系列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不仅是饶有兴味的,而且将窥见作品中包含的深层文化哲理。邱文治在他的论文中指出,曹禺创作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表现的对人生与自然的哲理思考,可以归纳为对于原始强力的推崇,对纯真童心的礼赞和对命运探索等哲理内核。曹禺的返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不同于老庄的清静无为物我两忘,它体现了曹禺的两种精神追求,一种是强悍粗犷的原始性,一种是天真无邪的童心,这是曹禺理想人性的两个侧面,最后又都归穴到命运的思考上面来。有的同志认为,曹剧的文化哲理意蕴集中在展现人性异化和渴望人性复归。《北京人》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正是作者试图找到灵肉两方面复归的途径。从这方面看,曹禺的原始主义更接近于卢梭,体现了作家的清醒理性和对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的困惑。有些同志则认为,曹禺戏剧的现实品格大于文化品格,曹禺虽然受西方的影响,但没有接受其背后的文化精神。研究曹禺取值的标准不应是西方文化,不应忽视作家身上的传统与民族的文化根基。离开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背景,就很难为中国现代作家定位。有的同志认为,作家的思想不是被动接受各种影响的容器,作家的主体精神是基于人类共同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身而思考存在问题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影响不能取代作家主体的思考。曹禺的创作之所以在本世纪产生广泛持久的共鸣,是因为他抒发了本世纪人类共有的情绪。

提交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近二十余篇,内容复盖面广,方法上也不拘一格。既有宏观性的纵横把握,也有微观的慎到探究,或论曹禺创作高峰,或论曹禺的人格理想,或从接受美学方面立论,或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都不乏新颖精见之处。胡润森的《论曹禺悲剧情节的分布程序与时间——因果联系》,把《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的情节分布程序划分为对称式、对比式、阶梯式、交换式、曲线式五种类型,从形式美学角度探讨了曹禺悲剧情节分布的规律特征。王泽龙的《戏剧艺术的“生命气息”》从戏剧文学、舞台环境、戏剧情景和观众审美心理等多重戏剧因素构成的戏剧氛围入手研究曹剧的美感效应。指出曹剧具有浓烈诗意的抒情氛围和神秘寓意的象征氛围。查振科、龙泉明的《命运与苦难的悲歌》,将繁漪、愫方、陈白露三个悲剧形象进行比较,从命运与生命苦难切入,剖析她们的悲剧性存生。

与会代表指出,对曹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对舞台艺术、传播学、与早期话剧的承续关系、与中国传统戏剧的关系、后期创作以创作心理、学识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研讨会开得圆满成功,体现了开放、求实的学术精神,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